

民主与本土文化

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

尹保云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民主与本土文化

——兼论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

王 康



民主与本土文化

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

尹保云 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尹保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01-008970-6

I. ①民… II. ①尹… III. ①民主-政治制度-研究-韩国-
1948~1987 IV. -D73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4605 号

民主与本土文化

MINZHU YU BENTU WENHUA

——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

尹保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970-6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是一个典型的儒教传统文化国家。朝鲜战争结束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但在 1962 年经济起飞后不到二十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三十年进入工业化成熟境界。这种发展速度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是罕见的。1987 年，韩国开始政治转型，至今又二十多年时间了。从目前情况看，在卷入“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的转型是属于比较平稳和成功的。

我于 1993 年出版了《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文津出版社）一书，1995 年由东方出版社再版，更名为《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此书侧重探讨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1995 年到 1996 年，我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现名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一年。开始的打算是从姓氏家谱入手研究韩国的文化，但这个计划被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当时，金泳三总统正在热情地推进韩国的“世界化”，公民运动团体则忙着呼吁对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的审判，高丽大学的学生因南北统一问题与政府发生持久的对抗。这些事件吸引了我的关注，我因此转向思考韩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查阅、收集这方面的文献与资料。

2003 年到 2004 年，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我在延世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研究的课题是“韩国的民主化转型研究”。我租住的房子在新林九洞。这里离延世大学很远，而离首尔大学却很近，是首尔市的一个“贫困村”，也是一个考试中心，住满了准备公务员、公安、医师、会计师等各类考试的大专毕业生，还有出租房屋的中产阶级、小片的贫民窟、鳞次栉比的小商店、闹哄哄的农产品市场以及在街角摆摊的小商贩等。这里尽管是贫困村，却能够让人感受到和谐、礼让、尊老爱幼、勤奋、自由、秩序等传统的或现代的道德元素的融合。对不同人群的观察，使我得到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在韩国的时候，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韩国为什么在 1948 年引进民主制度后进入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传统文化与民主制度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民主形式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条件与原则是什么？还有，从更高层面上说，民主的意义何在？韩国为什么要建设民主制度？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民主的发展？……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2004 年 8 月项目结束时，我写了《韩国的民主化》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只涉及 1987 年民主化以后，并没有讨论困扰着我的这些问题。回国后，这些问题仍挥之不去，促使我不断地思考，一直有写一本书的想法。

目前国内对韩国政治发展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研究，相关的朝文文献和英文文献更是数量庞大。在这些文献中，不少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许多史实得到了澄清，一些资料也得到很好的整理。没有这些研究成果作为起点，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首先对本书中引用、参考过的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本书试图以现有的研究为起点，通过对韩国民主发展进程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一回答，从而伸展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本书的初稿完成之后，特请中共中央党校的张珺瑰教授、赵

虎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文研究员、董向荣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的金景一教授、沈定昌教授和韩国延世大学的韩硕熙教授对书稿进行了讨论审定。这些学者都是研究东亚政治或韩国学的专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在此，向这些学者表示谢意。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韩国的政治发展研究”项目的资助。书是最近两年在项目资助下写出的，但思考问题和收集资料的时间跨度却很长。在此，除了对国际交流财团表示特别的感谢外，还想借此机会对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和高等教育财团表示谢忱。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一年期间，院长李永德先生、许昌武、池教宪、朴东俊、田宅秀等教授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曾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高等教育财团则曾经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韩国著名学者金俊晔先生和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主任杨通方先生对我的韩国学研究曾寄予厚望并给过许多帮助。我常为自己的懈怠和进步缓慢而感到惭愧，希望以此书作为微薄礼物向两位学界老前辈的督学致谢，并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最后，特别向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崔继新表示衷心感谢。人民出版社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郇中建编审付出许多辛勤的劳动，从而使本书及时与读者见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第三波研究与民主概念	1
二 威权主义政体的过渡性	10
三 韩国经验的特点	17
第二章 本土文化资源	20
一 传统制度的变迁	23
二 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	35
三 社会的张力与冲突	41
四 传统文化的柔韧性 with 脆弱性	49
第三章 民主形式的奠定	56
一 宪政萌芽与殖民全权主义	56
二 国际依附与政治精英的分裂	64
三 引进民主形式	72
四 形式民主与精英的权力斗争	80

2 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

五	民主形式的惩罚·····	92
第四章	民主与失控·····	98
一	李承晚政权遗留的问题·····	99
二	新形式与旧习惯·····	105
三	民众运动的压力·····	115
四	激进思潮的崛起·····	123
第五章	强政权与民主·····	137
一	5·16 军事政变的性质·····	137
二	加强集权的措施·····	147
三	精英结构的变化·····	156
四	民主的形式收缩与品质提高·····	163
第六章	官僚—威权主义：性质·····	175
一	经济成就与合法性危机·····	175
二	维新体制的脉络·····	183
三	与拉美官僚—威权主义的比较·····	193
四	政府与经济精英·····	201
第七章	官僚—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	211
一	反政府的民主运动·····	211
二	“首尔之春”的寒流·····	221
三	民主化的基础·····	228
四	六月抗争与民主化转型·····	238
第八章	民众与公民社会·····	243

一 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244
二 工人与工会	252
三 农民与农协	266
四 政治活跃的板块	276
第九章 两大党制的发展趋势	288
一 选举形式与社会文化因素	288
二 50 年代的两大党制趋势	294
三 一党独大制的失败	299
四 整合地域主义	306
五 自然的进化过程	316
结语：儒教国家的政治重构	321
一 集权主义的民主发展道路	321
二 民主形式的角色	325
三 儒教文化与民主形式	329
四 趋势	334
参考文献	338

第一章 绪 论

一 第三波研究与民主概念

上个世纪末，学术界兴起了对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研究。“第三波”这个概念是由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首先提出并传播的。在这本书中，亨廷顿指出，民主化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成波出现的，一波民主化就是指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共经历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二波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盟军占领促进了民主在一些国家的建立；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青年军官发动的废除独裁者马塞罗·卡埃塔诺的政变，则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第三波的特点是范围比前两波宽，不仅包括了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也卷入了拉丁美洲地区，出现在亚洲，吞没了苏联与东欧地区；同时，前两波之后都出现过大面积的“回潮”，即一些民主政体又退回到独裁政体，而第三波浪潮中新生的民主制度则多数比较稳定，只有个别“回潮”现象。^①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1—26页。

20 世纪后期，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这个现代化目标又被重新提上世界进步的日程。其间尽管插入了几次局部的战争、恐怖主义袭击、金融危机等国际性事件，但民主制度的建设一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一现实中的浪潮推动了政治学的研究。许多学者在“第三波”概念下讨论各种问题，不仅包括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也包括人权、公民社会组织、种族矛盾、恐怖组织、经济平等以及女权运动等问题。

截至目前，对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研究（以下简称“第三波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的研究。多数成果集中于对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的历史过程和具体细节作经验性的考察和分析。这些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然而，第三波研究在理论上的建树则显得比较薄弱，尤其是它的“民主”概念与“民主—不民主”的两分法过于狭窄，从而限制了整个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波研究中的“民主”概念是一个熊彼特式的概念。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给民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民主“本身不能是目的”，而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的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①“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②熊彼特的逻辑很清楚：他先把民主看做形式（方法），然后把这个形式归结为选举。这样做并无不可。因为，从一个方面看，民主的确是一种形式，是一个形式系统或曰管理技术的系统；从另一个方面看，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论述的主题而对“民主”概念加以限定。“民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宽，

①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 359 页。

②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99，第 395—396 页。

包括民主选举政府、自由与平等、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政治的诚实、权力的廉洁、决策透明性、参与、竞争、公民方面的美德等等，而具体研究常常是侧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所以，研究者们有必要对“民主”概念的某个侧面加以强调，就像熊彼特所做的这样。不过，这样对某个侧面的强调并不能代替原概念，否则就会导致概念本意的丧失。

第三波研究恰恰是犯了这个错误，把熊彼特的特殊限定的“民主”概念当做一般概念。亨廷顿认为：传统的民主概念的内涵太多，容易导致“含糊不清的规范并不能产生有用的分析结果”，所以只需从“选举”来界定民主就可以了，因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①进一步，亨廷顿提出了“民主—不民主”的两分法，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民主”与“不民主”两类。这两类政体相互对立、水火不容。区分它们的标准就是选举：不民主的国家就是“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普遍的选举投票参与”，而民主的国家则相反。^②这样，亨廷顿用一个熊彼特式的定义再加上一个两分法，就把民主概念大大地简化了。

应该指出，第三波研究从“选举”来界定民主，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一个意图。其合理性在于选举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缺少一个必要条件事物就不能成立；其意图在于针对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即：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民主与自由、平等、正义等概念一样，被不同的政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精英们加以不同的解释，以至于几乎所有不民主的政权都把自己标榜为“民主”的，甚至一些极端的专制也借着“捍卫民主”的口号而推行。而把“选举”这个必要条件作为民主的起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998，第8页。

②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998，第8页。

码标准，能够排除各种伪装民主、自诩民主以及反民主的诡辩。这即是亨廷顿所说的排除“含混不清的规范”的含义。

但这样做是有理论危险的。首先，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充分条件。在分析问题时，必要条件只能排除而不能肯定。我们可以作出“没有选举就不是民主”这样的排除性判断，但不能作“只要有选举就是民主”这样的肯定性判断。其次，用“选举”为标准来堵住各种不民主的诡辩也不一定有效。要知道在有的独裁体制中是有选举的，而且有的善于弄权的独裁者还特别喜欢利用选举和投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经历几十年冷战的对立、比较、体验和反思之后，国际社会达到了一个共识，即，“民主”有一些起码的标准，人民必须在民主制度中享受一些基本的保障和权利。否则就不是民主。这些保障和权利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投票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权利、财产权、隐私权、言论与结社的自由、享受社会福祉，等等。这些是价值目标上的共识，还有形式上的共识，即，国际社会也共同认识到选举、分权制衡、法律体系、政党竞争（包括党内竞争）、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等都是民主的基本形式要素，都是必要条件。尽管像许多人所说那样，民主应该被自由地追求而不能强加，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让大家模仿或照搬，但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民主的这些价值上和形式上的基本内容，很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以上共识说明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把它简化为“选举”可能会导致概念本意的丧失。仅就形式要素而言，选举无论怎样重要，也只是诸多形式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其他形式要素的存在，比如没有法律保障、公开透明的政党竞争（或党内竞争）、新闻舆论的监督等，选举就不可能达到公平境界。进

一步说,如果没有民主的其他形式要素存在,即便是有公正的选举,那么所选出的权力也不一定会保障公平、自由等价值目标的实现,甚至有可能是反对这些目标的。众所周知,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下的选举对公民来说是公正的,但古希腊的公民却没有什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可言,因此古希腊的民主与现代民主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很容易找到。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选举这个要素的单独存在可能会导致各种坏的结果。这些事实说明,把民主简单地界定为“选举”并由此建立起“民主—不民主”的两分法,必然会导致我们对民主的思考简单化。

在第三波研究中,有的学者意识到了熊彼特式的民主概念的局限性。比如,S. 门沃令(S. Mainwaring)等人提出了民主的四条最低的标准:(1)行政和立法部门通过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选出;(2)所有的成年人实质上具有投票权;(3)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自由地批评政府而不受到报复)得到广泛的保护;(4)被选举的权利是真正的统治权力,即它们不屈从于军队或教权的监护人控制。^①这四条最低标准中的前面两条说的是选举,后面两条则不是。这显然是想突破熊彼特—亨廷顿的狭窄概念。不过,第三波研究的痕迹还是很明显。前面两条是重复的,第四条涉及军人干预政治的问题,是针对拉美一些国家的情况说的,并无普遍意义。而一些更重要的形式要素却没有提到,比如权力制衡、政治竞争、法律体系的完善等,这些并不比选举次要。

民主是需要长期建设才能完成的艰巨工程。巴西前总统卡多

^① Scott Mainwaring, Daneil Brinks, and Anibal Perez Linan, "Classifying Political Regimes in Latin America, 1945-1999,"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ume 36, Spring 2001.

佐深有体会地把民主建设比做“一个困难的马拉松”。^① 由于民主概念的化简，第三波研究没能认识到这种困难性。它曾经流行一种乐观主义，即把民主建设归结为一场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政治转型，比如一场革命、一场群众运动、一个独裁者下台等偶然事件所带来的历史巨变，突然地使一个国家由不民主变为民主了，即“民主化”。这一“民主化”口号掩盖了民主建设的艰难曲折性。西方民主制的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可以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是通过一次民主化运动就达到了今天的境界的。英国的民主在世界上是最早建立的，美国的民主是世界上最顺利的，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同样经历了很多的发展阶段，妇女与黑人获得选举权也是很晚近的事情。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说有政治上的“迟发展优势”，即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参照而不必全靠自己摸索，但想通过一次大跳跃来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管理技术的系统而不是某个单项指标。

第三波研究的乐观主义很快被现实所挫伤。许多研究者发现，第三波转型的不少国家的民主是不合格的、粗糙的。尽管实现了选举，许多新生的民主却具有混合性特征，即“民主”与“不民主”的混合。它们被贴上了许多标签：“杂种政权”，“半民主”、“空虚的民主”、“选举的民主”、“伪民主”、“粗鄙的民主”、“半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选举的威权主义”，以及“自由议院的部分自由”，等。^② 这些不同的标签贴给了第三波浪潮中转型的不同国家的民主，描绘了一幅幅容易让人感染悲观主义情绪

①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Democracy as a Starting Poin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2, Number 1, 2001, p. 14.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0页。

②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的图像。还有许多对这些新生民主的效果的指责，认为它们并不能促进经济繁荣以及政府的忠诚和效率，不能保卫人权、和平及安全，因而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①对于新生民主的“腐败”、“低效率”、“经济失败”、“政治混乱”等的批评，不仅充斥在近年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之中，也充斥在大众媒介中，甚至否定民主、贬低民主、为不民主政体辩护成了有些学者和知识分子自鸣得意的资本。

上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犯了把民主简单化的错误。民主制度建设或许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最长的马拉松。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把建设民主制度看做人类的最后一个任务；黑格尔也认为在“自由”的意志认识到“民主”之后，绝对精神的运动就结束了，剩下的只是扩展民主制度了。这样的论断充分说明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民主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决定性的“马拉松”，是最重要的“金牌”。要得到这个“金牌”需要多次艰难的冲刺。

卷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许多国家并不是第一次冲刺。有的曾经有过民主的经历，有的一直在民主与独裁、文职政府与军政府之间更迭，也有的很早以来选举一直就没有间断过。拉美、亚洲等地的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它们都经历过多次冲刺，第三波只是最近的一次。因此，不能把第三波的这次冲刺看做它们政治史上的一个断裂点，从而认为此前就是不民主而此后就是民主。很多国家的情况是，在民主化转型之前就有一些民主的形式要素存在，之后也有许多不民主的因素存在。此前此后都具有“杂交政权”或“半民主”的性质。

本书所研究的韩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韩国的民主化

^① Shin,Doh Chull.“O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A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World Politics*,Vol.47,No1,1994,p.166.